

# 明清經學關聯性的一種考察

## ——論清代官編《詩經》專著徵引明人的詮解及其他

楊晉龍

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研究所研究員  
高雄師範大學經學研究所合聘教授  
臺北大學中國文學系合聘教授

### 一、前言

儒家是漢武帝（157B.C.-87B.C.，140B.C.-87B.C. 在位）元光（134B.C.-129B.C.）以後<sup>1</sup>，直至清朝滅亡（1911），總共二千多年以來，傳統中國文化的思想主流；《五經》是寄寓儒家思想最主要的典籍，《五經》經過歷史的衍化，進而「七經」、「九經」，到宋代於是逐漸形成「十三經」的概念，進入明代萬曆以後，終至於成爲今日大家熟知的經學叢書——《十三經注疏》<sup>2</sup>。更由於《五經》從漢武帝以來，長期做爲獲取利祿等甄試的必讀書籍，尤其隋代以後，更成爲科舉考試的主要用書，於是以《五經》到《十三經》做爲研究對象的「經學」，因而成爲傳統中國學術中受到最普遍關注的學問，每個朝代都有不少人投

---

此文原發表於二〇一六年十月二十一—二十一日桃園中央大學儒學研究中心主辦的「2016年『宋明清儒學的類型與發展III』」學術會議，感謝評論人蔣秋華教授及與會學者之指正；還有不具名審查學者們的費心審閱，並指正疏漏之處，使得此文訛誤得以減至最低，謹此致謝。此文係科技部：「明清《詩經》官書和清代《詩經》專著關係研究」（編號：MOST 103-2410-H-001-079-MY2）專題研究計畫的成果，渥蒙科技部提供經費與人力的挹注，謹此致謝！

<sup>1</sup> 漢武帝即位之初，實權掌握在「喜好黃老之學」的竇太后手中，必須等到西元前一三五年竇太后過世以後，漢武帝方能依照自己的意願，推行尊崇儒家的政策。

<sup>2</sup> 此問題的討論，可參考拙作：〈明代學術視野下的「十三經」論述研究〉，《文與哲》第29期（2016年12月），頁73-124。

入經學的研究。

普及性和關注度最高的經學，在不同朝代的實際研究，必然有側重與表現的不同，就今天多元學術的觀點來看，實在很難用單一的標準，進行優劣盛衰的評價，是以此種設置單一標準進行的高下評比，實質的學術意義並不大。不過不能否認的是傳統中國社會，甚至直到二十一世紀的今天，一直都存在有設置單一標準評價的事實。明代做為傳統帝制倒數的第二代，評價當然也只能開始出現在倒數第一名的清代。不過就現在一般常識性的認知而論，最早對明代經學進行優劣盛衰評量，並且給予極負面評價者，並不是清朝的官員或士人，反而是明朝滅亡時已經三十一歲，號稱盡忠於明朝的「明遺民」顧炎武(1613-1682)。顧炎武在《日知錄》中特別強調「經學之廢」，自永樂帝(1360-1424, 1403-1424 在位)下令編纂《四書五經大全》「始」；故曰「《大全》出而經說亡」；並以爲：「有明一代之人，其所著書無非竊盜而已。」<sup>3</sup>顧炎武此一類似「窩裏反」的全面性否定明代經學與學術的發言，成爲清代學者與官員們，批評明代學術與經學表現的口實。因爲這可是明代忠貞學者對其時代與朝代的學術評價故也。明朝滅亡時已十五歲的朱彝尊(1629-1709)，依循著顧炎武全面性否定的思路，同樣批評《四書五經大全》「乃至不全之書」；至謂明代士子「問以事之本末，茫然不知，經學于是乎日微」<sup>4</sup>！李光地(1642-1718)比較客氣的說：「明代經學，專精遜昔；《易》之一經，勦說尤多。」<sup>5</sup>完成於乾隆四十六年(1781)的《四庫全書總目》<sup>6</sup>，不僅徵引韓菼(1637-1704)順著顧炎武之論而發的「自《五經》有《大全》而經學衰」之論批評明代經學；同時也自下判斷說：「嘉隆之間，心學盛而經學衰。」甚至以爲明代學問，不過「剽剝」、「庸陋」而已，故「經義於是

<sup>3</sup> [清]顧炎武著，徐文珊點校：《原抄本顧炎武日知錄》（臺北：臺灣明倫書局，1979年），卷20〈四書五經大全〉，頁525-526；卷20〈書傳會選〉，頁526；卷20〈竊書〉，頁542。

<sup>4</sup> [清]朱彝尊：《經義考》（香港：迪志文化出版公司，2007年《文淵閣四庫全書電子版3.0版》），卷49〈胡氏廣等《周易傳義大全》·按語〉，頁19；卷297〈通說三·說經下·按語〉，頁45。以下用此版本者簡稱「《四庫》本」。

<sup>5</sup> [清]李光地：〈易義前選序〉，《榕村集》（北京：愛如生數字化技術研究中心，2006年《中國基本古籍庫》），卷11，總頁133。以下用此版本者簡稱「《古籍庫》本」。

<sup>6</sup> [清]慶桂等：《清高宗實錄》（臺北：中央研究院，2000年《漢籍電子文獻瀚典全文檢索系統》），卷1125，頁35。網址：<http://hanji.sinica.edu.tw/>。

遂荒」，因而說：「有明一代，八比盛而古學荒。」<sup>7</sup>「古學」當然包括經學在內。稍後的林昌彝(1803-1874?)也有清代「經學極盛」及「經學昌明」之論<sup>8</sup>。這個明代經學衰微而清代經學極盛的評價，從顧炎武《日知錄》開始，中間經由朱彝尊《經義考》、李光地、《四庫全書總目》及林昌彝……等等再一步地確認，最後結穴在皮錫瑞(1850-1908)《經學歷史》。皮錫瑞因而以為經學「宋以後為積衰時代」，且「宋、元、明三朝之經學，元不及宋，明又不及元」，最後的結論則是：「經學至明為極衰時代。而剝極生復，貞下起元，至國(清)朝，經學昌明，乃再盛而駸駸復古。」<sup>9</sup>生存時代與皮錫瑞相近的劉錦藻(1862-1934)也說：「近代經學之盛，無逾聖清。」<sup>10</sup>亦即相對而言，明代是經學成績最差的朝代，清代則是經學研究「再盛」、「極盛」的時代。這個明代經學「極衰」的印象式總體性評價，由於皮錫瑞《經學歷史》在臺灣學術界，不僅成為文史哲等相關科系認識傳統經學史的基本閱讀書目；同時《經學歷史》還直接成為許多「經學概論」、「國學導讀」，甚至其他經學史專著等基本教科書參考或抄襲的內容，因此明代經學「極衰」的觀點乃成為許多教師授課時的「成見」，對臺灣學界產生了極大的影響<sup>11</sup>。此種先入為主的狀況，就如同陸德明(550?-630)在《經典釋文·序錄》所說那樣：「處鮑居蘭，翫所先入；染絲斷梓，功在初變；器成采定，難復改移；一薰一蕕，十年有臭；豈可易哉！豈可易哉！」<sup>12</sup>確實很難消除，因此直到今日，依然還有許許多多學者，以顧炎武至皮錫瑞等鄙視明代經學之「流言」為真理，但卻不知用這類以「學術創發」為標準的評價，實與明代重視「實踐致用」的經學觀有別<sup>13</sup>，兩種學術觀點實際上可以並列而各

<sup>7</sup> [清]永瑤等編著，王伯祥斷句：《四庫全書總目》(北京：中華書局，1992年)，卷18〈詩經廣大全提要〉，頁146b；卷33〈經典稽疑提要〉，頁275a；卷36〈四書大全提要〉，頁302a；卷37〈重訂四書輯釋提要〉，頁309a；卷37〈三魚堂四書大全提要〉，頁314c；卷48〈通鑑綱目前編提要〉，頁434b等。

<sup>8</sup> [清]林昌彝：《射鷹樓詩話》(《古籍庫》本)，卷7，總頁86；卷14，總頁182。

<sup>9</sup> [清]皮錫瑞著，周予同註：《經學歷史》(臺北：河洛圖書出版社，1974年)，頁275、283、289-290。

<sup>10</sup> [清]劉錦藻：《清續文獻通考》(《古籍庫》本)，卷257〈經籍考一〉，總頁4290。

<sup>11</sup> 若以臺灣國家圖書館「博碩士論文加值系統」為對象，並以「經學」做為「標題」與「關鍵詞」搜尋，則八十六學年度開始有學位論文引述《經學歷史》，至一〇四學年度(1997.07-2015.06)，論文總數有一七五篇，其中一二篇即百分之六十四曾引述《經學歷史》，從而可大致推知《經學歷史》在臺灣學界流行及影響的狀況。

<sup>12</sup> [唐]陸德明：《經典釋文》(《四庫》本)，卷1〈序錄〉，頁1b-2a。

<sup>13</sup> 此可參考拙著：《明代詩經學研究》(臺北：國立臺灣大學中文研究所博士論文，

自成立，此種將可以複選的「選擇題」，當成僅能有一種正確答案的「是非題」之評價表現，正可見此一刻板印象對學界影響的深遠。

清代經學極盛，明代經學極衰，甚至是沒有經學的「流言」，實際上在上世紀後期，已有臺灣學者進行辨析<sup>14</sup>，然而即便如此，卻也難以撼動許多學者先入為主的刻板印象，知識發達的現代尚且都如此，則明代經學極衰的基本認知，在清代必然更是一種真理性的普遍共識了，這可以從李光地以下，直至皮錫瑞、劉錦藻等的發言了解。既然清代學術界，均普遍認定明朝經學是歷代最差的時代，清朝則是經學極盛的朝代，那麼極衰的明代學者經學研究成果，對清代的經學研究者而言，是否就被認定缺乏學習與參考的價值呢？極盛的清代經學和極衰的明代經學之間，是不是不可能存在有任何實質的關係呢？事實的狀況又如何呢？就學術研究的角度來看，當然也就有重新檢討確認的必要。證實或否證明清兩朝經學存在實質關係的探討，當然可以有許許多多的論證方式，如果根據清朝學界普遍認定明朝經學缺乏價值的前提加以考慮，那麼觀察清朝經學專著徵引明朝經學研究成果的表現，當該是最具備實證意義的探討方式。因為經學專著徵引的對象，無論是正面接受的徵引，或是反面批判的徵引，必然是因為認定該徵引對象具備學習、參考或駁斥的學術價值，因而纔有可能獲得編著者的青睞。

經學的範圍相當大，因此不可能以一篇小論文，進行整體全面性的討論。由於筆者長期關注《詩經》學，遂根據個人的學術專長，準備從《詩經》學的範圍進行研究。唯根據前賢實證性的歸納統計，清朝學者的《詩經》學專著至少有八〇〇多部<sup>15</sup>，同時《詩經》學專著的影響力也有大小之別，於是在無法進行全面性探討的前提下，選擇社會中閱讀普及率最高的官學教科書與科舉考試用書做

---

1997年），頁27-30的分析。

<sup>14</sup> 有關明代經學的成就與變化，可以參考林慶彰：《明代考據學研究》（臺北：臺灣學生書局，1983年）的相關討論。

<sup>15</sup> 蔣見元、朱杰人：《詩經要籍解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年），〈歷代《詩經》研究書目〉，頁178-205，收錄六一五部。蔣秋華、王清信纂輯：〈清代《詩經》著述現存版本目錄初稿〉，收入吳宏一主編：《清代詩話知見錄》（臺北：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研究所，2002年），頁665-724，收錄五〇〇部。寧宇：〈清代《詩經》學研究百年回顧〉，《山東社會科學》2003年第3期，頁114-115，謂其「初步統計，清人的《詩經》著述有800多部」（頁114）。陳國安：《清代《詩經》學研究》（蘇州：蘇州大學中國古代文學博士論文，2008年），頁205-230，〈附錄一：清代《詩經》學論著知見錄〉收錄約八七四部。魏菊英：《清代《詩經》學研究》（蘇州：蘇州大學中國古代文學碩士論文，2011年），頁137-163，〈清代《詩經》研究著作簡表〉收錄七四三部。

為研究對象，應該是個相當合理的選擇。理由在於學校教科書與科舉考試用書的影響範圍，必然遠大於一般學者的學術專著，無論從閱讀普及率或影響狀況的要求來看，選擇清代官方編輯的《詩經傳說彙纂》與《詩義折中》，這兩部做為學校教學與科舉考試之用的《詩經》學專著<sup>16</sup>，當作研究探討的主要對象，當該比選擇其他很難確定閱讀與影響狀況的專著，更具備實際的代表性。更何況就閱讀的接受而論，一般書籍內容是否接受，讀者可以有實質的決定權力；但除非沒有進入官學系統或參與科舉考試的意願，否則無論喜不喜歡、同不同意，官書都非得熟悉不可。基於前述的基本認知，於是設計此一研究議題，希望透過這兩部對多數閱讀者（當然不是全部）具有強制性接受的官編《詩經》學專著，徵引明代士人詮說為解的實際表現，用以了解明清兩代之間在《詩經》學上的關聯性，以便提供經學史相關研究者參考。

本文居於實證性的「外部研究」基本立場，以清代官方編輯的兩部教學與科舉必讀官書《詩經傳說彙纂》與《詩義折中》為主要探討對象，分析這兩部官書徵引明代士人解說的實況，用以初步辨析清代《詩經》學與明代《詩經》學之間存在的關聯性。研究使用的文獻，除紙本資料外，同時也使用網路資料庫的資料。研究的方式主要透過實際閱讀與電腦搜尋，進行資料的搜索、比對，首先將確定兩部官書解說徵引的資料，有那些來自明代士人；然後再進行歸納統計，以便說明兩部官書徵引明代士人解說的實際狀況，同時檢證兩部官書徵引對象上的狀況及其變化，並分析說明變化的原因與意義。研究進行的程序，將首先搜尋確認兩部官書徵引明代士人解說的狀況；其次分析說明兩部官書徵引明代士人解說的關聯性意義；接著舉出部分專著徵引的實證，以確認明清兩代確實存在實質關係；最後再統整研究所得成果，做成結論後結束本文。

## 二、清代官編《詩經》專著徵引明人詮解實徵

《詩經傳說彙纂》與《詩義折中》這兩部清代學校教學與科舉考試必讀的官

<sup>16</sup> [清]崑岡等：《清會典》（北京：中華書局，1991年影印清光緒25年石印本）卷三十二「凡教學，必習其禮事，明其經訓」下解說，《欽定詩經傳說彙纂》和《御纂詩義折中》均為頒行各省「俾士子咸資誦習」之書，且規定：「各省學官，時率諸生，與之講貫，令其熟習。學政考試經解，於御纂諸經中，摘取先儒異同之處發問，令生童等條對。」（總頁271-272）

編《詩經》學專著，徵引明代士人涉及《詩經》相關解說的狀況，對於了解明清兩代《詩經》學的實質關聯，具備實際有效的證據價值，進而可以更進一步做為明清兩代經學關聯性的有效證據，以下即歸納說明這兩部官編《詩經》專著徵引明代士人之論為說的實際表現狀況。

### （一）《詩經傳說彙纂》徵引明人詮說考述

《詩經傳說彙纂》完成於雍正五年(1727)，列名負責的主要官員是王鴻緒(1645-1723)，根據伍純嫻的實證性探討，《詩經傳說彙纂》是以明代胡廣等編輯的《詩傳大全》為底本，再增補符合官方編輯宗旨需要的其他文獻而成<sup>17</sup>。這些資料包括《詩傳大全》編纂時，還沒有出現的明代士人涉及《詩經》內容的相關解說。《詩經傳說彙纂》編纂的體例循順《詩傳大全》，因而也有〈引用姓氏〉的設計，考察《詩經傳說彙纂·引用姓氏》的內容，「明代」部分列舉了宋濂以下，至徐鳳彩等八十七位<sup>18</sup>。唯根據伍純嫻的統計，其中宋濂、王禕、楊士奇、胡廣、湛若水(1466-1560)、周斯盛、林兆珂(1574 前後)、陸南陽(1550-1570 前後)、陶其情(1600 前後)、顧大韶(1576-?)、胡胤嘉(1613 前後)等十一名，未見有徵引的實例<sup>19</sup>，不過這個統計排除〈卷首〉，因此稍有誤差，但後來已經稍作校正，然還稍有遺漏<sup>20</sup>。本文把〈卷首〉列入計數，重新觀察《詩經傳說彙纂》出現在〈引用姓氏〉的明代士人，實際未曾徵引者為：湛若水、林兆珂、陸南陽、陶其情、顧大韶、胡胤嘉、趙起元(1644 前後)等七人；未出現在〈引用姓氏〉，然確有徵引案例者：陳子龍、方應龍、黃光昇等三人；實際徵引的人數總量應該是八十三位。以下即根據引述數量的多寡為序，相同數量者以

<sup>17</sup> 伍純嫻：《《詩傳大全》與《詩經傳說彙纂》比較研究》（臺北：中國文化大學中文研究所碩士論文，2000年）。

<sup>18</sup> [清]王鴻緒等：《詩經傳說彙纂》（《四庫》本），卷首上，頁14b-20a。其中「凌氏濛初」誤作「林氏濛初」；「黃氏一正」誤作「黃氏正」。再者《四庫全書總目》將蔣悌生(1370 前後)列入明代；吳肅公列入清代，本文則尊重《詩經傳說彙纂》之意見，分別歸入元代與明代；且以為《詩義折中》成書於編纂《四庫全書》之前約二十年，故依《詩經傳說彙纂》之歸屬。

<sup>19</sup> 伍純嫻：《《詩傳大全》與《詩經傳說彙纂》比較研究》，頁113-119。

<sup>20</sup> 伍純嫻：〈《詩傳大全》與《詩經傳說彙纂》關係探論：簡析明代《詩經》官學的延續與發展〉，《中山人文學報》第20期（2005年夏季），頁81-118。關於明代徵引人數與數量統計見頁87。

生存時代先後為序，並考證被徵引對象是否有《詩經》學方面的專著<sup>21</sup>，經統整而製成下表，以方便觀察說明。

《詩經傳說彙纂》徵引明代士人名錄及其《詩經》學專著

徵引數量	姓名	生存年代	《詩經》學專著
224	朱善	1314-1285	詩解頤
186	黃佐	1490-1566	詩傳通解、詩旁通
165	何楷 <sup>22</sup>	1600?-1646?	詩經世本古義
128	鄒泉 <sup>23</sup>	1510 前後	詩經折衷講義、詩經說約
110	姚舜牧	1543-1628?	詩經疑問
95	朱道行	1615 前後	詩經集思通
90	季本	1485-1563	詩說解頤
53	沈守正	1572-1623	詩經說通
52	郝敬	1558-1639	毛詩原解、毛詩序說、詩談
51	徐鳳彩	1601-1657	毛詩博義、詩經輔注
50	黃一正	1590 前後	詩經埤傳
49	徐常吉	1583 進士	毛詩翼說、詩論辯、詩說
42	錢天錫	1622 前後	詩牖
39	徐光啓	1562-1633	毛詩六帖講義、詩經傳稿
38	唐汝諤	1555-1641?	毛詩微言、詩經微言合參、毛詩刪補微言
37	顧起元	1565-1628	爾雅堂家藏詩說、毛詩正變指南圖、詩經金丹彙考、詩經難字、新刻顧鄰初太史朱批詩經金丹
28	張彩	1591 前後	詩原、詩說略
28	王志長	1585-1662	毛詩注疏刪翼、詩經註疏
27	胡紹曾	1630 前後	詩經胡傳
26	鄧元錫 <sup>24</sup>	1527-1593	詩繹
25	王逢	1368-1438 前後	詩經講說

<sup>21</sup> 參考劉毓慶和筆者合編的〈明代《詩經》著述考目〉，劉毓慶：《從經學到文學：明代《詩經》學史論》（北京：商務印書館，2001年），〈附錄一〉，頁440-459。另外再透過諸如《中國方志庫》、《古今圖書集成》等之類的網路資料庫查尋。

<sup>22</sup> 《詩經傳說彙纂·綱領三·論諸家說詩得失》徵引何氏楷曰：「權訓詁則鄭、孔之功決不可誣；明義理則朱子之言深得其要。」語出何楷《詩經世本古義·原引》，然原文實作「權訓詁則鄭、孔之功決不可誣；課進修則朱子之言深得其要。」編纂者刻意將「課進修」改成「明義理」，並不符合何楷的本意。見〔清〕王鴻緒等：《詩經傳說彙纂》，卷首下〈蓼蕭〉，頁44a；〔明〕何楷：〈原引〉，《詩經世本古義》（《四庫》本），卷首，頁7b。

<sup>23</sup> 王鴻緒等：《詩經傳說彙纂》，卷10〈蓼蕭·集說〉，頁71a：誤作「鄔氏泉曰」。

<sup>24</sup> 同前註，卷10〈南山有臺·集說〉，頁68a。誤作「鄭氏元錫曰」。

18	馮復京	1573-1622	六家詩名物疏、說詩譜
16	朱謀埠	1550-1624 ?	詩故
15	陳推	1570-1620 前後	毛詩正宗、詩經質疑
13	呂柟	1479-1555	毛詩序說
12	顧夢麟	1585-1653	詩經說約
10	沈萬鈞	1597 舉人	詩經類考
9	薛應旂	1500-1574	方山詩說、詩經章句
8	鍾惺	1574-1624	批點詩經、詩經纂注、詩經備考、詩經圖史合考、詩觸、詩測、毛詩解
8	陳子龍	1608-1647	詩經人物備考 <sup>25</sup>
7	陳際泰	1567-1641	詩經讀
7	方應龍	1600 前後	詩經心鉢
6	胡廣 <sup>26</sup>	1370-1418	詩傳大全
6	陸深	1477-1544	儼山詩微
6	張所望	1556-1635	無
6	鄒忠胤	1613 前後	詩傳闡、詩傳闡餘
5	薛瑄	1392-1464	讀詩記
5	章甫	1424- ?	詩經肯綮
5	唐順之	1507-1560	詩經講義、詩經主意、新刻詩經八進士釋疑講意
5	瞿景淳	1507-1569	詩經主意、詩經質言
5	許天贈	1535-1577 前後	詩經正義
5	汪應蛟	1574 前後	學詩略、詩禮品節
5	范王孫	? -1643	詩志
4	楊慎	1488-1559	升庵詩說、四詩表傳、詩經指要、毛詩說
4	韋調鼎	1640 前後	韋氏詩說考定、詩經備考
3	張榜	1565-1620 前後	讀詩私箋
3	魏浣初	1580-1638	詩經脈講意、毛詩振雅
3	凌濛初	1580-1644	聖門傳詩嫡冢、孔門兩弟子言詩翼、詩逆、詩考
3	吳肅公	1626-1699	詩問
2	何英	1417-1468 前後	詩經詳釋
2	楊守陳	1425-1489	詩私抄
2	袁煒	1508-1565	毛詩定見

<sup>25</sup> 現當代學界某些研究者，受到《四庫全書總目》的影響，有誤將《詩問略》當作陳子龍著作者，唯經詳細考辨，《詩問略》實即吳肅公《詩問》，並非陳子龍著作。考辨見拙作：〈論《詩問略》之作者與內容〉，鍾彩鈞主編：《傳承與創新：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研究所十周年紀念論文集》（臺北：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研究所籌備處，1999年），頁653-697。

<sup>26</sup> 《詩傳大全》係胡廣等編輯，故將三筆《詩傳大全》的徵引歸入胡廣名下計數。



2	吳瑞登	1560-1600 前後	詩經引躍
2	葉向高	1559-1627	葉太史參補古今大方詩經大全、詩經講義舉業便讀
2	陳所學	1590 前後	無
2	薛志學	1594 前後	詩經傳旨一覽
2	趙一元	1595 前後	詩經大全纂、詩經理解
2	陳組綬	1600-1634 前後	詩經副墨
2	陸化熙	1613-1626 前後	詩通
1	宋濂 <sup>27</sup>	1310-1381	無
1	王禕 <sup>28</sup>	1321-1372	詩草木鳥獸名急就章
1	楊士奇 <sup>29</sup>	1365-1444	無
1	王鏊	1450-1524	詩經口義
1	邵寶	1460-1527	詩簡端錄
1	王守仁	1472-1529	詩經臆說
1	崔銑	1478-1541	無
1	周斯盛 <sup>30</sup>	1537-1569 後	無
1	袁仁	1479-1546	毛詩或問
1	胡明勗	1490-1570 前後	詩經集成圖說
1	朱得之	1500 前後	印古詩說
1	章潢	1527-1608	詩原始、學詩原體
1	黃洪憲	1541-1600	學詩多識
1	孫鑛	1542-1613	孫月峰先生批評詩經
1	馮時可	1547-1617	詩臆
1	向楫	1560-1644 前後	無

<sup>27</sup> 〈綱領一·論傳詩源流〉徵引宋濂三筆文獻資料，其中二筆出自《元史》，一筆出自《詩集傳音義會通序》。見王鴻緒等：《詩經傳說彙纂》，卷首下，頁10a-b；〔明〕宋濂等：《元史》（《四庫》本），卷189〈儒學·胡一桂傳〉，頁12a-b；卷190〈梁益傳〉，頁19a。宋濂：《詩集傳音義會通序》，收入朱彝尊：《經義考》（《四庫》本），卷112，頁2b-3a引。

<sup>28</sup> 徵引王禕之文，見〈綱領三·論諸家說詩得失〉，文出《王忠文公文集·叢錄》。見王鴻緒等：《詩經傳說彙纂》，卷首下，頁44a；〔明〕王禕：《王忠文公文集》（《古籍庫》本），卷20，總頁344。唯原文作：「朱子《集傳》，其訓詁亦用毛、鄭。」《詩經傳說彙纂》改作「其訓詁多用毛、鄭」，「亦用」與「多用」之內涵有別。朱彝尊《經義考》徵引亦作「多用」，《詩經傳說彙纂》或即抄錄《經義考》之文。見朱彝尊：《經義考》，卷108，頁6b引。

<sup>29</sup> 徵引楊士奇之文一筆，見王鴻緒等：《詩經傳說彙纂》，卷首下，頁10b；文出〔明〕楊士奇：《跋·詩傳通釋》，《東里續集》（《四庫》本），卷16，頁16a-b。

<sup>30</sup> 《詩經傳說彙纂》係引述其《（嘉靖）山西通志》，見王鴻緒等：《詩經傳說彙纂》，卷首上，頁24a。

1	曹學佺	1574-1646	詩經質疑、詩經剖疑
1	周昌年	1550-1600 前後	無
1	金聲	1598-1645	無
1	楊廷麟	?-1646	詩經講義鞭影、詩經聽月、硃訂詩經揆一宗旨
1	張次仲	1589-1676	待軒詩記、毛詩弋志箋記
1	陳鴻謨	1602 貢生	詩經治亂始末注疏合疏
1	黃光昇	?-1586	讀詩蠡測（演詩蠡測）
1	劉楨	不詳	詩經多識錄

這八十三位作者，總共徵引了一七八九筆資料，扣除明確徵引地方志的作者周斯盛與資料後，《詩經傳說彙纂》總共徵引八十二位明代士人《詩經》相關解說一七八八筆資料。諸家徵引數量的多寡如上表所示，一筆者有二十三位作者，二筆者十位，三筆者四位，四筆者二位，五筆者七位，六筆者四位，七筆者二位，八筆者二位，九筆以上除二十八筆有二位外，其他都是一位，超過一〇〇筆徵引的有五位，最多是朱善二二四筆，其次為黃佐一八六筆、何楷一六五筆、鄒泉一二八筆、姚舜牧一一〇筆等。然僅徵引一筆和二筆文獻的作者，加總有三十三位，佔全部作者的百分之四十左右，比例相當高。雖然不知道王鴻緒等編輯的方式，但合理推測這一類官方編輯的教科書類型經學專著，不太可能重新創作，大致會像《詩傳大全》那樣，有依循的底本，這類僅是徵引一、二條文獻的狀況，不太可能是看完整本書後的選擇，當該是抄錄編輯底本或相關參考書籍，因而方才出現此種一位作者僅徵引一筆或二筆資料之類低度徵引的狀況。

再考《詩經傳說彙纂·凡例》第二條有「朱子表章聖經，惟《詩集傳》與《周易本義》為成書，尤生平精意所屬，今標以為宗。而自漢迄明諸儒先之解詁，采其義理精當，有裨經旨者，錄在朱《傳》之後為『集說』；其文義小殊，彼此相備者，為折其中；或二說各成其是，則別為『附錄』，用資參考」之文<sup>31</sup>，可見《詩經傳說彙纂》固然以「尊朱」為大原則，卻並非盲目的「尊朱」，是以〈書前提要〉說：「雖以《集傳》為綱，而古義之不可磨滅者，必一一『附錄』，以補缺遺。」<sup>32</sup>可知能被「附錄」徵引之解說，在編纂官員心目中，顯然其某些見解已具備與朱熹(1130-1200)《詩集傳》之說「各成其是」的可能性，因此不得不加以引錄。統計《詩經傳說彙纂》的「附錄」有

<sup>31</sup> 同前註，卷首上〈凡例〉，頁1a-b。

<sup>32</sup> [清]紀昀等：〈詩經傳說彙纂書前提要〉，同前註，目錄頁8b-9a。

二三八個，徵引學者七十三位，徵引五二五筆資料。漢至唐徵引十二位學者的二一六筆資料；宋代有三十三位二四七筆；元代有七位十九筆；明代有二十一位四十三筆。徵引筆數較多者，明代之前為：孔穎達（96筆）、鄭玄（70筆）、嚴粲（47筆）、毛萇（37筆）、呂祖謙（26筆）、范處義（26筆）、蘇轍（23筆）、歐陽修（18筆）、程子（18筆）、李樗（13筆）、王安石（12筆）。明代則：何楷（9筆）、郝敬（8筆）、胡紹曾（5筆）、黃佐（2筆）、張彩（2筆）、吳肅公（2筆）；此外：朱善、楊守陳、呂柟、季本、楊慎、鄧元錫、朱謀埠、鄒泉、黃一正、徐常吉、曹學佺、馮復京、錢天錫、錢天錫、周斯盛等（1筆）。依照〈凡例〉的解說，可見明代除周斯盛之外的二十位學者，其涉及《詩經》的某些解說，雖徵引數量遠不及孔穎達、鄭玄等，但顯然也具備某些可與朱熹《詩集傳》「各成其是」的價值，此亦可見《詩經傳說彙纂》的編纂群，並未完全抹煞明代《詩經》學的成就，否則就不可能將這二十位學者的解說納入「附錄」之內<sup>33</sup>。以上是《詩經傳說彙纂》徵引明代士人詮說的實際狀況。以下接著歸納統計《詩義折中》徵引的狀況。

## （二）《詩義折中》徵引明人詮說考述

《詩義折中》完成於乾隆二十年（1755），根據乾隆帝（1711-1799，1735-1795在位）在〈御纂詩義折中序〉所謂「辛未（乾隆十六年[1751]）秋，間與尚書孫嘉淦論及諸經，其所見平實近理，因先從事《毛詩》，授以大指，命之疏次其義」之言<sup>34</sup>，可知最初奉命負責編輯的官員為孫嘉淦（1683-1753），因此賀長齡（1785-1848）遂謂《詩義折中》乃孫嘉淦「承旨纂修之書」<sup>35</sup>；唯成書刊刻時領銜列名者實為傅恆（1720?-1770）。根據武英殿刻本《詩義折中》書前所列「正總裁官」，依次為：傅恆、來保（1681-1764）、孫嘉淦等三人；「副總裁官」依次為汪由敦（1692-1758）、納延泰（?-1762）、劉綸（1711-1773）等三人，是

<sup>33</sup> 筆者書寫此文之際，並未意識到「附錄」代表的學術意義與功能，經由審查學者之指正，因而加上此段分析，謹此致謝。此分析對了解清朝官方實際看待明代學術，確實大有幫助。

<sup>34</sup> [清]乾隆帝：〈御纂詩義折中序〉，[清]傅恆等：《詩義折中》（《四庫》本），御製序頁1a。

<sup>35</sup> 賀長齡稱孫嘉淦「經濟皆從經學出，故臨事無不透根，《詩義折中》即其承旨纂修之書」。[清]賀長齡：〈與黃惺齋年兄書〉，《耐菴詩文存》（《古籍庫》本），卷6，總頁72。

以由名列首位的傅恆領銜。再據乾隆帝之〈序〉出現「授以大指」、「親為釐定」的肯定之言，可知乾隆帝在編纂此書的過程之中，確曾積極介入指示，否則當不至於出現此類「自誇」其功的說詞。

《詩義折中》雖然沒有完全悖離《詩經傳說彙纂》尊崇朱熹《詩集傳》的基本詮釋宗旨，但在詮釋的立場上與形式體例的安排上，確實也有不少與《詩經傳說彙纂》不同之處，例如不僅刪去《詩經傳說彙纂》卷首的所有項目，同時也刪除朱熹的《詩序辯說》；正文中也沒有那類爲了說明或展示與《詩集傳》解說相近或不同的「集說」、「附錄」與「按語」等等項目，更特殊的是「朱《注》」在《詩義折中》內，係與其他徵引文獻資料平列，已經沒有類似《詩經傳說彙纂》中具有單獨存在的特殊地位了；另外在卷數、分卷與分章上，也多有別於《詩經傳說彙纂》者。根據筆者之前的研究顯示，《詩義折中》相對於《詩經傳說彙纂》，在詮釋宗旨與形式體例上，至少有：「經解宗旨脫離朱熹《詩集傳》束縛」、「資料蒐錄定於一統」、「以《詩經》本文爲解說主體」、「解經形式趨向於精簡」等四個方面的改變<sup>36</sup>。其中最重要者莫過於從《詩經傳說彙纂》以朱熹《詩集傳》爲詮釋對象的編輯宗旨，在《詩義折中》明確轉換爲直接面對《詩經》經文作解的總體性改變，此種直接面對《詩經》的解釋目的，在於傳達解經者的經典認知觀點，因此可以不必如《詩經傳說彙纂》因爲面對《詩集傳》，同時也不是毫無條件的全面性接受《詩集傳》的觀點與解說，因而必須徵引較多可以發明或商榷《詩集傳》的相關解說，這當也就是導致《詩義折中》徵引相關條目大量減少的主因。《詩義折中》雖然大量刪除徵引的條目，卻依然保留有許多徵引明代士人詮說的條目，徵引的實況經統計後如下表：

《詩義折中》徵引明代士人名錄

徵引人物	何楷	朱善	鄒泉	黃佐	徐常吉	張彩	鄧元錫	萬尙烈	季本	姚舜牧 <sup>37</sup>
徵引數量	35	15	6	5	4	3	3	3	2	2

徵引人物	朱道行	呂柟	章潢	黃洪憲	唐汝諤	郝敬	張榜	徐光啓	陳際泰
徵引數量	2	1	1	1	1	1	1	1	1

<sup>36</sup> 參考拙作：〈從《詩經傳說彙纂》到《詩義折中》——清代兩部官訂《詩經》注本詮釋形式之比較〉，黃沛榮主編：《王叔岷先生學術成就與薪傳論文集》（臺北：國立臺灣大學中國文學系，2001年），頁367-392。

<sup>37</sup> 傅恆等：《詩義折中》，卷19〈周頌·武〉，頁33a：誤作「姚舜牧曰」。此條見王鴻緒等：《詩經傳說彙纂》，卷20〈周頌·武·集說〉，頁66a。

徵引人物	沈守正 <sup>38</sup>	黃一正	萬時華	方應龍
徵引數量	1	1	1	1

以上係閱讀與搜尋電子版文淵閣《四庫全書》本《詩義折中》之結果。《詩義折中》總共徵引了二十三位明代士人的九十二筆資料，有二十一位作者與《詩經傳說彙纂》重複，僅新增二位：萬尚烈（1560-1650 前後）<sup>39</sup>、萬時華（1590-1639）<sup>40</sup>。萬尚烈有《詩述傳測》、《詩測定本》等《詩經》學專著，萬時華有《詩經偶箋》。徵引最多的是何楷三十五筆和朱善十五筆，這兩位徵引資料數量最多的明人，同時也是《詩經傳說彙纂》徵引數量最多的第一名與第三名；至於徵引數量僅一筆和二筆文獻者有十五名，佔全部明代徵引士人的百分之六十五以上，較之《詩經傳說彙纂》的比例更高。誠如前文所言，出現此種低度徵引的狀況，合理猜測應是來自編輯底本，一般來說閱讀整部書籍後，僅選擇其中一、二資料的可能性，當該不會太大。再經由詳細的交叉比對，發現那類與《詩經傳說彙纂》重複的作者，《詩義折中》徵引條目的內容，包括僅徵引一、二條資料者，確實多數與《詩經傳說彙纂》相同，可知這些條目有許多是源自《詩經傳說彙纂》，從而可以合理推定《詩經傳說彙纂》乃是編輯《詩義折中》時的重要底本。不過再根據出現有二位超出《詩經傳說彙纂》徵引之外的明代作者，以及出現某些未見《詩經傳說彙纂》徵引的條文<sup>41</sup>，這同時也顯示《詩義折中》在編輯過程中，必然還參考其他《詩經》學的專著，根據萬尚烈與萬時華的四筆資料，均出現在何楷《詩經世本古義》的情況，則編輯者參考的可能是何楷之書，這當

<sup>38</sup> 傅恆等：《詩義折中》，卷 17〈大雅·民勞〉，頁 31b：誤作「沈守約曰」。該條內容見王鴻緒等：《詩經傳說彙纂》，卷 18〈大雅·民勞·集說〉，頁 59a。案：南宋紹興（1131-1162）年間曾為禮部侍郎的沈該，字守約，精於《易》，有《易小傳》，徵引者作「沈守約」，或者因此而誤。

<sup>39</sup> 《詩義折中》徵引萬尚烈的三筆資料，均見於何楷《詩經世本古義》：卷 16〈文王〉，頁 1b；見《古義》，卷 10 之下，頁 43b。傅恆等：《詩義折中》，卷 18〈常武〉，頁 47a；見《古義》，卷 17，頁 56b。傅恆等：《詩義折中》，卷 19〈良耜〉，頁 42b；見《古義》，卷 1，頁 67b。

<sup>40</sup> 《詩義折中》徵引萬時華一筆資料，亦見於何楷《詩經世本古義》。傅恆等：《詩義折中》，卷 18〈常武〉，頁 46b；見《古義》，卷 17，頁 53b。

<sup>41</sup> 例如：《詩義折中·商頌·殷武》徵引郝敬曰：「三代以前，王都多在西北，楚據東南，地半天下，王者南面出治，失楚則如面牆，故曰：『維汝荆楚，居國南鄉。』言近而且要也。」（卷 20，頁 31b）此段《詩經傳說彙纂》未曾徵引。然此文最後一句實作：「言至近而要也。」〔明〕郝敬：《毛詩原解》（臺北：新文豐出版公司，1984 年），第 2 冊，卷 36〈商頌·殷武〉，總頁 595。

然僅能是合理的推測而已。這是關於《詩義折中》徵引明代士人相關詮說進入其解經系統的實況。

清代兩部《詩經》學官書，在詮釋過程中徵引明代士人涉及《詩經》學詮說的實況如此，雖然兩部官書在詮釋主體對象上，存在解《傳》或解《經》的差別，然而編纂者卻不約而有的都有徵引明代士人相關解說，進入其詮釋系統的實例，可見明代經說並非全無價值，至少在《詩經》學方面的表現可以如是說：再由兩部官書確實徵引的實際表現，就可以有效說明清代學界雖然極力貶抑明代經學，卻沒有絕對否定明代經學的價值，至少官編書籍的表現即是如此，從而可知兩代在經學的研究上，至少在《詩經》學上，確存在有某種實質的關聯性。

### 三、清代官編《詩經》專著徵引明人詮說析論

清代這兩部在某些部分具備「互為補充」關係<sup>42</sup>，做為學校教學與科舉考試必讀的官書：《詩經傳說彙纂》與《詩義折中》，若以完成編纂的時間而論，《詩經傳說彙纂》完成於雍正五年（1727），《詩義折中》完成於乾隆二十年（1755），兩書的編成相差二十九年，古人以三十年為一世<sup>43</sup>，以為人事習俗改變至此而定。雖然傳統帝王「作之君，作之師」的自我期許，以及「教化」臣民為天生責任的基本要求，對帝王而言，從來就不會改變過，然而經過一世的時間淘洗，學術不可能不變化；乾隆帝與康熙帝（1654-1722，1662-1722 在位）的觀點，不可能完全一模一樣；《詩義折中》的編輯群孫嘉淦、傅恆等與《詩經傳說彙纂》編輯群王鴻緒等的《詩經》學觀點，更不可能前後一致；再加上乾隆帝個人積極介入等等的因素，這些必然都會影響到兩書解說內容的取捨，解說內容決定徵引對象的選擇。以下即藉由前文的實際統計歸納，觀察說明兩書在徵引數量與對象上的差異，以及對清代《詩經》學可能存在的影響作用。

清代這兩部做為教學與考試之用的官書，如果從「學術創見」的角度評價，則以《詩經傳說彙纂》純粹站在發揚《詩集傳》解說的先設立場，因而或者從正面發揮，或者從負面糾補，以便增強鞏固朱熹《詩集傳》解說權威的編輯表現論

<sup>42</sup> 盧啓聰：《〈詩經傳說彙纂〉研究：以編纂背景、體式內涵與思想特質為中心》（臺北：國立政治大學中國文學系碩士論文，2013年），頁115-125、141。

<sup>43</sup> 〔魏〕何晏集解，〔南朝梁〕皇侃義疏：《論語集解義疏》（《四庫》本）「子曰：『如有王者，必世而後仁。』」《注》引孔安國曰：「三十年曰世。如有受命王者，必三十年仁政乃成也。」（卷7〈子路〉，頁8b）

之<sup>44</sup>，誠如盧啓聰研究指出的那樣，主要的貢獻僅能是「在文獻、資料性方面的參考價值」<sup>45</sup>，並不具備學術創發的價值。倒是《詩義折中》幾乎可視為表現乾隆帝個人學術觀點的論著，即使以學術創見的標準評價，《詩義折中》的學術創發價值，雖然至今還沒有被確實探討，但應該也有其《詩經》學研究上的地位。不過即使有類似學者個人學術樣態的表現，但由於身為帝皇者擁有的教化臣民之基本設想，必然影響到編輯之際預設的目的與預設讀者，因而顯然就不會與一般學者著書之際的基本設想相同，同時產生的學術與學習上的影響力，當然也就更不能比較了，因為做為教學與科考用書的官編書籍，當是一般正常學習者最有可能最先接觸的註解本，這就如同前舉陸德明所言「先入為主」的作用那樣，於是也就很容易成為有心於科舉而選擇《詩經》為專經者，或者準備出版科舉考試的參考書者，或者用心於《詩經》學探討的學者等等，首先想到並最可能優先選擇閱讀參考的書籍。反過來說，一般私人的著作，無論「人氣」有多高，在傳統「通路」與「資訊」不發達的社會，必然無法與「通路」與「資訊」都暢通，經由官方系統頒給全國學校的官編書籍相比，因此可以合理推測，無論在閱讀選擇或詮解參考上，雖然沒有經過實證性的調查研究，但卻可以斷定在閱讀與參考比例上，官書必然高於一般私人書籍，此一推測應該不會是過分荒謬的幻想。

前述推理如果沒有太大的訛誤，當該可以合理推測在整個清代社會，官方編輯提供教學與科考之用的經學專著，相對於其他私人學術專著，必然具備較高的閱讀與參考比例，因此官編書籍中徵引的前人經說，自也因著水漲船高，清代的一般讀者與學術研究者，自然不可能完全遺忘這些明代士人解經之說的存在。此種讀者在閱讀與參考之際產生的關聯性，當然和徵引人數與數量的多寡成正比。首先以《詩經傳說彙纂》而論，實際徵引的作者人數，若不包括徵引的專書作

<sup>44</sup> 關於《詩經傳說彙纂》徵引某些與《詩集傳》觀點不同解說資料的用途，有必要更為深入的分析了解。蓋《詩經傳說彙纂》的編輯既然是以朱熹《詩集傳》作為詮解的唯一對象，則《詩經傳說彙纂》徵引發明朱熹《詩集傳》觀點的資料，例如徵引「義理精當，有裨經旨」解說的一四九二個「集說」，固然是增強《詩集傳》解說的可信度；即使像徵引「各成其是」解說的二三八個「附錄」，其中雖也有某些與《詩集傳》觀點並不一致的解說，但其目的當然也絕不是要消滅《詩集傳》，反而是站在尊崇《詩集傳》前提下，從編輯者認定何者最符合《詩經》原意的角度，修正補充《詩集傳》解說上的某些小瑕疵，因而達成增強《詩集傳》解說權威的最終目的，所以纔會說這是「負面糾補增強」。

<sup>45</sup> 盧啓聰：《〈詩經傳說彙纂〉研究：以編纂背景、體式內涵與思想特質為中心》，頁133-138。

者，則周代一位、漢代二十四位、魏晉六朝十二位、隋代一位、唐代十三位、五代二位、宋代八十三位、元代十八位<sup>46</sup>。徵引的明代作者有八十三位，數量與宋代相等，佔全部實際徵引作者二三七位的百分之三十五。○二，亦即當清代讀者閱讀《詩經傳說彙纂》之際，平均每三筆引述的資料，就有一筆屬於明代士人的解說，此種「高出現率」(high incidence disabilities)造成的效果，就如同今日頻繁出現的電視廣告那樣，必然對讀者的記憶產生植入的強迫性影響。

再以《詩義折中》而論，徵引的數量雖遠低於《詩經傳說彙纂》，但卻也徵引了總數七四〇筆的資料。根據實際閱讀與網路搜尋，並扣除明代士人的資料之後，關於《詩義折中》徵引的書籍及其他朝代士人的狀況，其中徵引書籍部分，僅徵引一條者，包括《子貢詩傳》、《韓詩》、《大戴禮記》、《尚書大傳》、《韓詩外傳》等五部書<sup>47</sup>，至於徵引二筆以上者見下表：

《詩義折中》徵引書籍名錄及數量<sup>48</sup>

書名	詩序	尚書	周禮	左傳	周易	禮記	國語	毛傳	中庸	春秋胡傳	鄭箋	大學	史記	杜預注	論語	列女傳
數量	136	29	22	19	18	14	13	11	9	8	4	4	3	3	2	2

《詩義折中》徵引各代士人名錄及數量

朝代	周代			漢魏					唐代				宋代					
	孔子	子思	孟子	賈誼	司馬遷	太史公	劉向	鄭康成	王肅	孔穎達	顏師古	杜佑	張守節	朱子	呂祖謙	蘇轍	嚴粲	范處義
數量	37	5	15	3	2	3	1	20	3	12	1	1	1	134	22	22	15	12

<sup>46</sup> 此據伍純嫻的搜尋統計，見伍純嫻：《〈詩傳大全〉與《詩經傳說彙纂》比較研究》，頁 103-113。唯《詩經傳說彙纂·詩序辨說·賓之初筵·辨說》，詩序下，頁 31b，徵引唐代章懷太子李賢 (654-684)《後漢書·孔融傳注》一條，伍純嫻誤作明代的李賢 (1408-1466)。見伍純嫻：〈《詩傳大全》與《詩經傳說彙纂》關係探論：簡析明代《詩經》官學的延續與發展〉，頁 87。

<sup>47</sup> 傅恆等：《詩義折中》，卷 5，頁 19a、卷 14，頁 9b、卷 15，頁 6b、卷 15，頁 40a、卷 16，頁 41b 等處，全都以「《傳》曰」、「《記》曰」表述。「《傳》曰」還包括胡安國《春秋傳》、杜預《左傳注》、《毛詩傳》等。「《記》曰」還包括《禮記》。

<sup>48</sup> 《周官》出現五次，一次與《周禮》重複，計入《周禮》內。再者卷六：「《傳》云：『日上曰名。』」（頁 17b）實抄朱鶴齡《詩經通義》（四庫本，卷 3，頁 57a）。《毛傳》原文實作「日上為名」，見〔漢〕毛亨傳，〔漢〕鄭玄注，〔唐〕孔穎達疏：《毛詩注疏》（四庫本），卷 8，頁 36b。



朝代	宋代																	
姓名	輔廣	程子	謝枋得	歐陽修	呂大臨	陸佃	張子	范祖禹	李樗	黃樞	蘇軾	楊時	曹粹中	劉彝	徐鉉	司馬光	曾鞏	陳傅良
數量	10	9	6	4	4	3	3	3	3	3	2	2	2	2	1	1	1	1

朝代	宋代			元代					
姓名	胡安國	項安世	黃震	朱公遷	劉瑾	許謙	李公凱	胡一桂	陳櫟
數量	1	1	1	9	5	3	1	1	1

《詩義折中》徵引最多的書籍是一三六筆的《詩序》，徵引最多的士人則是一三四筆的朱熹。如果徵引的經書不計，扣除作者相同的書籍後，僅毛萇《毛傳》、韓嬰《韓詩外傳》等二部，「太史公」當指司馬遷，故徵引作者的實際狀況為：周人三名、漢魏人七名、唐人四名、宋人二十六名、元人六名，再加上明人的二十三名，總共僅徵引了六十九位士人的資料，徵引的明代士人佔作者總數的百分之三十三·三三。明代士人的總體「出現率」，狀況大致與《詩經傳說彙纂》相當，即平均每三位徵引的士人，就有一位是明人，這應該也和《詩經傳說彙纂》一樣，對讀者的閱讀產生強迫性記憶植入的影響。

觀察清代兩部《詩經》官書徵引明代士人詮說資料的狀況，經由前述閱讀與搜尋的統計歸納，兩部《詩經》官書總共徵引八十五位明代士人的詮說。徵引明代士人詮說的表現，相對於兩部官書徵引解說的所有對象而言，明代作者所佔的比例都在三成以上，此種徵引的表現，相對於其他朝代，比例應該不算低。就實質的表現而論，這兩部《詩經》官書徵引的明代士人詮說，由於經常出現在閱讀或參考者的眼前，對於讀者與研究者不可能毫無影響，因而也就可以合理推測其對清代的《詩經》學不可能毫無作用，從而可以了解明清兩代之間，至少在《詩經》學的發展與接受上，確實存在實質的關聯性。

#### 四、清人《詩經》學與明人關聯的實務性考徵

清代兩部《詩經》官書的內容，經由前述實證性歸納書中內容實際表現的分析，從而也就可以有效證明兩書存在徵引明代士人詮說的事實，再經由「閱讀可能性」與「高頻率出現」的理由，因而也就可以合理推測而認定透過兩部《詩

經》官書徵引的傳播擴散，對清代士人的閱讀吸收與研究參考帶來實質性的影響。前述的推測固然合理可信，但畢竟只是邏輯意義下的可能性而已，如果沒有提供實證性的文獻，最多也只能獲得可能性甚高而接近事實的結論而已，是以還必須提供實際有效的案例，用以加強並證明前述推斷的有效性與可靠性，以下即依此構思而提供具備實證性質的有效案例。

就閱讀吸收的狀況而論，由於時過境遷，現代人無法進行實證性的考察，然而透過出版刊刻的狀況，大致可以獲得部分的證實。蓋刊刻出版是爲了提供讀者閱讀，根據一般市場經濟「供需」之間的基本運作原則，沒有需求就沒有供給，所以必須有讀者市場，方才有可能刊刻出版。兩部官書實際出版的狀況，今天當然無法完全掌握，僅能根據殘留至現代的版本立論，就現在所能獲得的版本訊息，除去《四庫全書》和《四庫全書薈要》等九部抄本外，《詩經傳說彙纂》至少還有雍正年間的內府刊本、江西官府刻本、甘肅巡撫許容刻本；乾隆年間武英殿刻本；同治年間馬新貽刻本、湖北崇文書局刊本、江西書局刻本；光緒年間廣州翰墨園刻本、江南書局刊本、戶部刻本、上海鴻文書局石印本、長沙漱芳閣刊本、蘇廷五刻本、清晚期翻刻本等十四種版本，刊刻時間從雍正年間到清末。至於《詩義折中》至少有乾隆年間武英殿刻本；道光十八年刊本、鹽運使如山刻本；同治東昌「書業德」刻本；光緒年間善成堂刻本、上海書局石印本；宣統二年石印本；以及文光堂刻本、經元堂刻本、埽葉山房刊本、（另本）埽葉山房刊本、清末刻本等十二種版本，時間自乾隆年間到清末<sup>49</sup>。根據這些無意間留下的殘存版本，可知兩部官書出版以後，直到清朝末年，社會的需求從來就沒有間斷過，從而也就可以證明清代讀者透過這兩部官書徵引的影響，對明代士人《詩經》學相關詮說的閱讀與吸收從未間斷過。

清人《詩經》專著徵引參考明代士人《詩經》相關詮說的實際狀況，由於清代《詩經》學專著超過八〇〇部，同時兩部官書徵引爲說的明代士人有八十五位之多，一時自也無法全面性的深入調查，因此暫時選擇《詩義折中》徵引的二十三位明代士人當作考察對象，主要是其中有二十一位與《詩經傳說彙纂》重

<sup>49</sup> 此係搜尋：臺灣國家圖書館《古籍特藏文獻資源》網站，網址 <http://rbook2.ncl.edu.tw/Search/Index/0>，檢索日期：2016年9月30日；以及《全國漢籍データベース》網站，網址：<http://kanji.zinbun.kyoto-u.ac.jp/kanseki?detail>，檢索日期：2016年9月30日。還有「Google」搜尋，以及參考盧啓聰：《《詩經傳說彙纂》研究：以編纂背景、體式內涵與思想特質爲中心》（頁51-52）而成。

複，且還有二位新加入徵引行列的作者，在未能將八十五位作者全數列入考察之際，暫時如此選擇當該也可以具備有部分實質的代表性。再者本文考察的清代《詩經》學專著，基於方便性與準確性，因此係以《中國基本古籍庫》收錄者為主。在研究探討上這兩個部分的自我限制，當然對所得結果的精確度造成影響，但在實證性與可信度上則並無影響，因此就本文研究論證的需要而言，應該也足以用來考察明代士人《詩經》相關詮說進入清人《詩經》專著的部分實況。若以現在設定的條件搜尋，所得成果則如下表所述：

清人《詩經》學專著徵引明人《詩經》詮說實錄

作者	生存時代	《詩經》專著	徵引明代士人名錄
朱鶴齡	1606-1683	詩經通義	何楷 <sup>50</sup> ；季本；黃佐；鄧元錫；姚舜牧；呂柟；郝敬；徐光啓；沈守正；萬時華。
陳啓源	1600?-1689	毛詩稽古編	何楷；朱善。
錢澄之	1612-1694	田間詩學	何楷；朱善；黃佐；鄧元錫；萬尙烈；章潢；徐光啓；陳際泰；沈守正；萬時華。
姚際恒	1647-1775?	詩經通論	何楷。
嚴虞惇	1650-1713	讀詩質疑	章潢；郝敬；萬時華。
陳大章	1659-1727	詩傳名物集覽	何楷；鄧元錫。
顧棟高	1679-1759	毛詩類釋	何楷；季本；徐常吉；朱道行；郝敬。
		毛詩訂詁	何楷；朱善；季本；鄒泉；黃佐；徐常吉；鄧元錫；姚舜牧；朱道行；章潢；唐汝諤；郝敬；徐光啓；沈守正；黃一正。
黃中松	1700 前後	詩疑辨證	何楷；朱善；郝敬。
劉始興	1723 舉人	詩益	朱善；方應龍。
姚炳	1724 副貢生	詩識名解	何楷；鄧元錫；姚舜牧；萬時華。
姜炳璋	1709-1786	詩序補義	何楷；朱善；季本；黃佐；張彩；姚舜牧；唐汝諤；郝敬；徐光啓；沈守正；黃一正。
范家相	1715-1769	詩瀋	何楷；朱善；季本；郝敬。
顧鎮	1720-1792	虞東學詩	何楷；朱善；季本；鄒泉；黃佐；徐常吉；張彩；鄧元錫；姚舜牧；朱道行；呂柟；章潢；郝敬；徐光啓；沈守正；萬時華。
汪梧鳳	1726-1771	詩學女爲	何楷；朱善；季本；鄒泉；徐常吉；張彩；鄧元錫；姚舜牧；郝敬；陳際泰。
崔述	1740-1816	讀風偶識	張彩；陳際泰。

<sup>50</sup> 清人徵引明人之際的稱號並不一致，除本名外，或加氏、或稱書、或稱字、或稱號。以「何楷」爲例，即有：何楷、何氏楷、何玄子、何元子、何黃如、何氏古義、何氏詩古義、世本古義、詩世本古義、古義等等不同稱號。另外「朱善」也稱：朱氏善、朱備善、朱氏備善等。

牟應震	1744-1825	詩問	何楷；鄧元錫；郝敬；沈守正。
胡文英	1765 副貢生	詩經逢原	何楷。
陳壽祺	1771-1834	齊詩遺說考	何楷。
		韓詩遺說考	何楷。
胡承珙	1776-1832	毛詩後箋	何楷；朱善；季本；鄒泉；黃佐；徐常吉；張彩；鄧元錫；姚舜牧；朱道行；呂柟；郝敬；徐光啓；沈守正；黃一正。
徐璈	1779-1841	詩經廣詁	何楷；朱善；季本；黃佐；張彩；鄧元錫；姚舜牧；章潢；郝敬；徐光啓；陳際泰。
馬瑞辰	1782-1853	毛詩傳箋通釋	何楷；徐光啓。
馮登府	1783-1841	三家詩遺說	何楷。
包世榮	1784-1826	毛詩禮徵	何楷。
陳奐	1786-1863	詩毛氏傳疏	何楷。
魏源	1794-1856	詩古微	何楷；季本。
顧廣譽	1799?-1866	學詩詳說	何楷；朱善；季本；鄒泉；黃佐；徐常吉；鄧元錫；姚舜牧；朱道行；呂柟；章潢；黃洪憲；郝敬；徐光啓；沈守正。
李超孫	1801 舉人	詩氏族考	何楷；季本；郝敬。
黃位清	1804 貢生	詩緒餘錄	何楷；朱善；張彩；朱道行；黃一正。
陳僅	1813 舉人	詩誦	季本。
劉燦	1819 優貢生	嚴氏詩緝補義	何楷；朱善。
方玉潤	1811-1883	詩經原始	何楷；朱善；季本；鄒泉；黃佐；徐常吉；張彩；朱道行；章潢；唐汝諤；郝敬；徐光啓；陳際泰；沈守正；黃一正。
龔橙	1817-1870	詩本誼	何楷。
多隆阿	1818-1864	毛詩多識	何楷（械林案）。
成僎	1828 前後	詩說考略	何楷；朱善；季本；鄒泉；黃佐；郝敬；徐光啓；黃一正；張榜 <sup>51</sup> 。
易佩紳	1826-1906	詩義擇從	何楷。
王先謙	1842-1917	詩三家義集疏	何楷；徐光啓。
尹繼美	1859 舉人	詩管見	何楷；朱道行；徐光啓。
馬其昶	1855-1930	詩毛氏學	鄒泉。

這四十部具名徵引明代士人的私人性《詩經》專著<sup>52</sup>，來自三十八位作者。作者

<sup>51</sup> [清]成僎：《詩說考略》徵引「張氏曰『舍旃舍旃爲止讒之法』，信然」（〔《古籍庫》本〕，卷7〈唐風·采芣〉，總頁123）之文，實即張榜之論。《詩經傳說彙纂·唐風·采芣·集說》：「張氏榜曰：『讒人似是之言，能投於卒然之頃，而不能不露於審察之後，故「舍旃舍旃」爲止讒之法。』」（卷7，頁30a）此條又見抄於傅恆等：《詩義折中》，卷7，頁19b。

<sup>52</sup> 清代部分《詩經》學專著徵引明代士人《詩經》詮說之際，僅稱姓氏而不稱名，例如陳孚《詩傳考·苜之華》徵引有向氏曰：「言羊以見陸物，言魚以見水物，其去〈無羊〉、〈魚麗〉之世遠矣。」此條即《詩經傳說彙纂》的「向氏楫曰」之類，這部分暫時無法全

生存時間自清初到清滅，橫跨整個清朝存在的歷史時段。表現的《詩經》學立場：有尊崇官學者，如：顧鎮；有尊崇宋學者，如：嚴虞惇；有尊崇漢學者，如：陳奐、魏源等；有獨立派者，如：姚際恆、崔述、方玉潤等，各書的立場各式各樣。經由前述隨機選擇的實證性考察結果，在作者涵蓋的時段整全、書籍《詩經》學立場多樣的前提下，雖然不是全面整體性的考察，但其結果當也可用來證實明代士人的《詩經》學詮說，確實與清代《詩經》的研究或參考，具有實質性的關聯，甚至影響。

再者若依照徵引書籍多寡的次序排列，則四十部專著徵引二十三位明代士人詮說的狀況，少則一位，多則十六位。整體的表現為：何楷（35部）、郝敬（16部）、朱善（16部）、季本（15部）、徐光啓（13部）、鄧元錫（11部）、黃佐（10部）、姚舜牧（9部）、沈守正（9部）、朱道行（8部）、鄒泉（8部）、張彩（8部）、萬尙烈（7部）、章潢（7部）、徐常吉（7部）、黃一正（6部）、萬時華（5部）、陳際泰（5部）、呂柟（4部）、唐汝諤（3部）、方應龍（1部）、黃洪憲（1部）、張榜（1部）等。同時也可以發現四十部專著中徵引數量居前端的何楷與朱善，在兩部官書中同樣也屬於徵引數量較多的對象，由此可見「高出現率」對讀者接受與記憶確實有其實質的影響力，這同時也證明《詩經傳說彙纂》與《詩義折中》對清代的《詩經》學，確實產生某種程度的內在影響。

透過前述有關版本刊刻狀況的考察，清人部分《詩經》專著徵引的實際表現，在兩部官書的刊刻一直進行，因而呈現社會需求從未減歇；還有具名徵引的四十部專著，《詩經》學立場各式各樣，作者生存時段自清初到清滅，因而具有實證可信度等等的條件限制下，本節的分析討論當該可以相當有效的證明：明清兩代《詩經》學之間，確實存在某種實質的關聯性。清代學者固然有不少鄙視明代經學的言論，卻並非全面性的抹殺明代經學的價值，這不僅可以證實明代經學研究成果的價值，同時也可以證明清儒在學術上表現的客觀態度，雖然很可能是受到官書暗示的結果。

面性查考。〔清〕陳孚：《詩傳考》（《古籍庫》本），總頁250。王鴻緒等：《詩經傳說彙纂》，卷16〈小雅·苕之華·集說〉，頁22b。

## 五、結論

明末顧炎武等以來，對明代經學的負面評價，影響了整個清代，且及於現代。清儒對經學研究的自信，以及經學研究成果的表現，同時也讓現代人透過比較，因而加強了對顧炎武等一類鄙視明代經學者言論的相信程度，明代經學「極衰」而清代經學「極盛」的對比性成見，於是成為許多學術研究者的刻板印象。因此對於明清兩代之間，在經學研究上關聯性的探討，雖然已經引發關注，但至今依然相當不足。本文即在此一觀察認知下設計的研究議題，除了希望可以借助官書的徵引及其強大的傳播影響力，有效證實明清兩代之間在《詩經》學研究上的關聯性之外，同時也隱藏了另一個更為理想的目的，那就是希望以此文粗淺的研究為此類研究議題的「敲門磚」、「墊腳石」，因而引發其他經學研究者，進行更為全面性、更為整體性的後續研究，例如探討其他經典的關聯狀況之類，最終則期待可以更全面性了解明清兩代之間經學研究上的關聯狀況。這不僅對經學研究者具有意義，同時對其他學科的研究者，因為提供了更實際的有效答案，自然也具備有相當意義的學術的價值。這類研究同時也可以用來觀察清儒的經學研究與官學之間的關聯性，這部分的研究同樣具有相當重要的學術價值與意義，可惜也是屬於比較少受到關注的議題，筆者也希望經由此一研究的刺激，提醒學界更加注意此一重要的議題，因而有更多的學者投入此類議題研究的行列。以上是設計本研究的意圖與期望。

本研究基於「外部研究」的立場，探討清代官編《詩經》專著徵引明代士人詮說的實況及其可能造成的影響，還有透過清儒《詩經》學專著徵引明代士人涉及《詩經》詮說的實況，用以了解明代士人經說受到清儒青睞的狀況，進而有效的證實明清兩代之間，在《詩經》學研究上，確實具備了實質性關聯的關係。研究獲得的成果大致可以歸納為下列幾項：

首先，明末顧炎武明代經學「衰廢」的印象式評價，以及清儒自稱經學「極盛」的誇飾，成為幾百年來學術界的共識性成見，然則在學術界刻板印象中，這兩個經學「衰廢」與「極盛」強烈對比的朝代，在經學研究上到底存在何種關係？這應該是個相當值得注意探討的問題，這也就是引發設計本文研究的原始動機。

其次，經由《詩經傳說彙纂》和《詩義折中》兩部《詩經》學官書內容的實證性考察，了解《詩經傳說彙纂》至少徵引了八十三位明代士人涉及《詩經》學

的相關解說；《詩義折中》至少徵引了二十三位明代士人的相關解說，其中有二十一位與《詩經傳說彙纂》重複，同時徵引內容也大致相同，因而可確定《詩經傳說彙纂》為編輯《詩義折中》的參考底本，但因為還新加入二位學者，並且也出現與《詩經傳說彙纂》徵引之外的條目，可知《詩義折中》另有參考的底本，根據相關證據的推測，這另一個參考底本，很可能是何楷的《詩經世本古義》。

其三，考察《詩經傳說彙纂》徵引可與朱熹《詩集傳》解說「各成其是」的「附錄」下，總共徵引漢代以下學者七十三位，明代學者有二十一位，排除因地理沿革而徵引的周斯盛，則明代二十位學者佔全部七十二位的百分之二十八；四十二筆資料佔五二四筆的百分之八。所佔比率固然不是很高，但至少表現出康熙、雍正間《詩經傳說彙纂》的官方編纂群，並沒有像顧炎武等般全面否定明代的經學，否則就不可能在「附錄」下徵引明代學者的解說，因而在無形中承認這二十位明代學者的《詩經》解說，具有與朱熹《詩集傳》「各成其是」的價值與地位。

其四，統計《詩經傳說彙纂》和《詩義折中》徵引的明代士人數目，均超過徵引整體數量的三成以上，就是兩部書平均每三位徵引學者中，就有一位是明代士人，如此高的「出現率」對讀者的接受與記憶必然造成強迫性的植入效果，因而形成一種「先入為主」的先驗性記憶。是以可以合理的推測，這種情況對清代學者的研究參考，必然造成實質性的影響，就是說清代的《詩經》學研究，在實質上與明代士人的《詩經》學成果，具有選擇接受的內在關聯性。這當然是站在純理性的邏輯推理前提下，合理獲得的最終結果。

其五，邏輯抽象推理的結果，在現實上僅能是理想性的近似形式，並非實際的表現狀態，必須再提供更有效的實證案例，方可確認邏輯推理下所得成果的有效性到底有多高。經由《詩經傳說彙纂》和《詩義折中》這兩部官書出版的狀況，以及搜尋《中國基本古籍庫》收錄《詩經》學專著徵引明代士人詮說狀況等的實證性考覈，在兩部官書的刊刻，從出版到清代滅亡，從未減歇；徵引專著的《詩經》學立場不一，且作者生存時段自清初到清滅等有效的實證條件下，從而證明清代《詩經》學和明代《詩經》學之間，確實存在內在的關聯性。

其六，本文研究的過程與結果，比較有效的證明了清代《詩經》學與明代經學，在內容上具備有實質關聯性的事實，當然不是全面性，但確實存在；同時也證實部分清儒的《詩經》學專著，確實受到官編《詩經》專著的影響。所得研究

成果有助於了解確定明清兩代《詩經》學的關聯性，以及清代官編《詩經》專著影響某些清儒《詩經》學專著的事實。對於明清經學史、學術史，尤其《詩經》學史的研究者，提供了部分甚有實證價值的有效答案，這對關注相關議題學者的研究，當然也就具備實質的助益功能。



# 明清經學關聯性的一種考察

## ——論清代官編《詩經》專著徵引明人的詮解及其他

楊晉龍

本文旨在探討明清兩代《詩經》學研究上的內在關聯性，最終希望可以推廣而探索明清兩代經學研究上的實質關聯性。本文立基「外部研究」的實證性立場，經由歸納統計《詩經傳說彙纂》與《詩義折中》徵引明人詮說的實況，以及透過《中國基本古籍庫》收錄清儒《詩經》專著徵引明人說解的實情，有效證明清人的《詩經》學專著，確實有接受參考明人《詩經》詮解的事實，從而證明了明清兩代《詩經》學具有內在的關聯性，同時經由許多清儒《詩經》學專著徵引的明人資料，來自清代兩部官書的事實，從而也就證明清代官學對《詩經》學確實產生影響的實況。研究成果有助於實際了解明清兩代《詩經》學上的關聯及官學對學術研究的影響，同時也提供明清經學史、學術史，尤其是《詩經》學史等的相關研究者，部分有效的答案，對相關領域研究的深入與發展，或當有某些助益焉。

關鍵詞：明清 官書 經學 《詩經》 《詩經傳說彙纂》 《詩義折中》

## An Examination of Relationships between Studies of the *Shijing* in the Ming and Qing Dynasties

YANG Chin-lung

This paper examines relationships between studies of the *Shijing*, in order to explore the actual relationships of the studies of the Chinese Classics during the Ming-Qing period. Looking at how the Qing literati quoted Ming writers' interpretations of the *Shijing*, in works such as the *Shijing zhuan shuo huizuan* (Gathered explanations of Zhu Xi's *Shijing*) and the *Shiyi zhezhong* (Balanced interpretations of the *Shijing*), as well as citations in a large electronic database, it argues that the interpretations of the *Shijing* given by Ming writers can truly be found in the studies of the *Shijing* written by Qing authors and other official academic works compiled at the emperor's order, thus proving not only that there should be an intrinsic relationship between studies of the *Shijing* during the Ming and Qing dynasties, but also that Ming studies of the *Shijing* influenced official academic learning in the Qing period.

**Keywords:** Ming-Qing period   official academic books   Chinese Classics   *Shijing*  
*Shijing zhuan shuo huizuan*   *Shiyi zhezhong*

## 徵引書目

- 王禕：《王忠文公文集》，收入劉俊文總纂：《中國基本古籍庫》，北京：愛如生數字化技術研究中心，2006年。
- 王鴻緒等：《詩經傳說彙纂》，收入《文淵閣四庫全書電子版 3.0 版》，香港：迪志文化出版公司，2007年。
- 永瑤等編著，王伯祥斷句：《四庫全書總目》，北京：中華書局，1992年。
- 皮錫瑞著，周予同註：《經學歷史》，臺北：河洛圖書出版社，1974年。
- 伍純嫻：〈《詩傳大全》與《詩經傳說彙纂》關係探論：簡析明代《詩經》官學的延續與發展〉，《中山人文學報》第20期（2005年夏季），頁81-118。
- ：《《詩傳大全》與《詩經傳說彙纂》比較研究》，臺北：中國文化大學中文研究所碩士論文，2000年。
- 全國漢籍データベース，網址：<http://kanji.zinbun.kyoto-u.ac.jp/kanseki?detail>。檢索日期：2016年9月30日。
- 成俔：《詩說考略》，收入劉俊文總纂：《中國基本古籍庫》，北京：愛如生數字化技術研究中心，2006年。
- 朱彝尊：《經義考》，收入《文淵閣四庫全書電子版 3.0 版》，香港：迪志文化出版公司，2007年。
- 何晏集解，皇侃義疏：《論語集解義疏》，收入《文淵閣四庫全書電子版 3.0 版》，香港：迪志文化出版公司，2007年。
- 何楷：《詩經世本古義》，收入《文淵閣四庫全書電子版 3.0 版》，香港：迪志文化出版公司，2007年。
- 吳宏一主編：《清代詩話知見錄》，臺北：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研究所，2002年。
- 宋濂等：《元史》，收入《文淵閣四庫全書電子版 3.0 版》，香港：迪志文化出版公司，2007年。
- 李光地：《榕村集》，收入劉俊文總纂：《中國基本古籍庫》，北京：愛如生數字化技術研究中心，2006年。
- 林昌彝：《射鷹樓詩話》，收入劉俊文總纂：《中國基本古籍庫》，北京：愛如生數字化技術研究中心，2006年。
- 林慶彰：《明代考據學研究》，臺北：臺灣學生書局，1983年。
- 郝敬：《毛詩原解》，臺北：新文豐出版公司，1984年。
- 國立故宮博物院、東吳大學：《古今圖書集成》，臺北：國立故宮博物院、東吳大學，1999年。
- 崑岡等：《清會典》，北京：中華書局，1991年。
- 陳孚：《詩傳考》，收入劉俊文總纂：《中國基本古籍庫》，北京：愛如生數字化技術研究中心，2006年。
- 陳國安：《清代詩經學研究》，蘇州：蘇州大學中國古代文學博士論文，2008年。

- 陸德明：《經典釋文》，收入《文淵閣四庫全書電子版 3.0 版》，香港：迪志文化出版公司，2007 年。
- 傅恆等：《詩義折中》，收入《文淵閣四庫全書電子版 3.0 版》，香港：迪志文化出版公司，2007 年。
- 賀長齡：《耐菴詩文存》，收入劉俊文總纂：《中國基本古籍庫》，北京：愛如生數字化技術研究中心，2006 年。
- 楊士奇：《東里續集》，收入《文淵閣四庫全書電子版 3.0 版》，香港：迪志文化出版公司，2007 年。
- 楊晉龍：〈明代學術視野下的「十三經」論述研究〉，《文與哲》第 29 期（2016 年 12 月），頁 73-124。
- ：〈從《詩經傳說彙纂》到《詩義折中》——清代兩部官訂《詩經》注本詮釋形式之比較〉，黃沛榮主編：《王叔岷先生學術成就與薪傳論文集》，臺北：國立臺灣大學中國文學系，2001 年。
- ：〈論《詩問略》之作者與內容〉，鍾彩鈞主編：《傳承與創新：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研究所十周年紀念論文集》，臺北：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研究所籌備處，1999 年。
- ：《明代詩經學研究》，臺北：國立臺灣大學中文研究所博士論文，1997 年。
- 寧宇：〈清代詩經學研究百年回顧〉，《山東社會科學》2003 年第 3 期，頁 114-115。
- 臺灣古籍特藏文獻資源，網址：<http://rbook2.ncl.edu.tw/Search/Index/0>。檢索日期：2016 年 9 月 30 日。
- 臺灣博碩士論文加值系統，網址：<http://ndltd.ncl.edu.tw/cgi-bin/gs32/gswweb.cgi/login?o=dwebmge>。檢索日期：2016 年 9 月 30 日。
- 劉俊文總纂：《中國方志庫》，北京：愛如生數字化技術研究中心，2011-2013 年。
- 劉毓慶、楊晉龍：〈明代《詩經著述考目》〉，劉毓慶：《從經學到文學：明代《詩經》學史論》，北京：商務印書館，2001 年。
- 劉錦藻：《清續文獻通考》，收入劉俊文總纂：《中國基本古籍庫》，北京：愛如生數字化技術研究中心，2006 年。
- 慶桂等：《清高宗實錄》，據漢籍電子文獻瀚典全文檢索系統，網址：<http://hanji.sinica.edu.tw/>。
- 蔣見元、朱杰人：《詩經要籍解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 年。
- 盧啓聰：《《詩經傳說彙纂》研究：以編纂背景、體式內涵與思想特質為中心》，臺北：國立政治大學中國文學系碩士論文，2013 年。
- 魏菊英：《清代詩經學研究》，蘇州：蘇州大學中國古代文學碩士論文，2011 年。
- 顧炎武著，徐文珊點校：《原抄本顧炎武日知錄》，臺北：明倫書局，1979 年。